

陌上草青



陌上草青

一個歷史學者的自述

鄭會欣
著

中華書局

目 錄

自序	v
第一章 家世淵源	001
第二章 父親與母親	027
第三章 回內地參加建設	049
第四章 小學與中學	071
第五章 「文革」開始了	092
第六章 上山下鄉	115
第七章 「一打三反」	138
第八章 煤礦工人	156
第九章 南大學子	180
第十章 民國史研究的重鎮	211
第十一章 走進學術研究的大門	234

自序

第十二章	重返香港	262
第十三章	分別與團聚	281
第十四章	從零開始	302
第十五章	繼續學習	333
第十六章	饒公與我	352
第十七章	研究與教學	386
第十八章	開拓新領域	420
第十九章	董浩雲研究	438
第二十章	退休後的生活	459
附：學術論著目錄（1983-2020）		495
後記		519

還是先講講我為甚麼要寫這個回憶吧。

瞿秋白先生在他犧牲前寫的那篇《多餘的話》中說，他原本就是個文人，之所以後來參加革命，那純粹就是個「歷史的誤會」。而我在回顧自己一生的時候，想到大部分時間從事的職業是歷史研究，心想這對我來說不也同樣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嗎？因為習史並非我的初衷，我自幼對歷史也沒有甚麼特殊的興趣，高中畢業後先是插隊，後來調到煤礦，10年多的蹉跎歲月，浪跡天涯，但上大學仍是我心中的夢想。所幸鄧公決定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給了我們這代人一個機會，1978年我終於參加了高考，因為數理化都忘得差不多了，只能考文科，而文科的選擇很少，歷史分數又最高，所以後來就上了南京大學歷史系。那時只要能上大學就好，至於學甚麼專業那都是次要的。然而自從上了大學、特別是大學畢業後分配工作，將歷史研究作為自己的終生職業之後，我對這一選擇卻一直沒有感到後悔。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自然十分清楚回憶與口述對於研究歷史、特別是近現代史是多麼重要，我們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經常要閱讀各種人物的傳記、日記、回憶或者口述資料，不僅如此，平時我們還會常常動

員大家寫寫回憶、接受採訪甚麼的。然而到了自己頭上那又成了另外一回事，我就從來沒有想過要寫甚麼回憶的文字，因為覺得自己就是個芸芸眾生中的小人物，所經歷的事情更是無關輕重，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真沒甚麼好寫的。

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授課時，每學期系裏都會安排博士研究生擔任我的助教，他們大都是來自內地名牌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亦多從事近代史和民國史的研究課題，課餘時經常到我辦公室來聊天，我也常常跟他們說些自己的經歷。也許是年齡大了吧，這些年每次外出開會，或是與一些年輕的學者見面，也總是不經意間聊些個人過去的經歷和故事，會後常常和與會者外出喝茶聊天，也會說些學界的趣聞軼事。因此許多年輕人都說，最喜歡會後與鄭老師在一起，聽他講過去的故事。不少人也都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希望有時間作個口述訪問，或者乾脆自己把過去的經歷寫出來。但我總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有甚麼東西值得寫呢？

激起我寫回憶的衝動可能源於下面幾件事。

前幾年有一次在上海開會，會後與 30 多年前在青島講習班相識的老朋友胡君見面，聊天時相互講起各自的家史，他說起不久前整理了父親的回憶錄並上網公開，我聽了以後怎麼覺得與剛看過的一本書內容那麼相似呢？細問之下，那位作者所引用的材料，竟正是胡兄父親的回憶！這真是一個巧合，我即從中牽線，讓他們互相認識，同時亦極力鼓勵他爭取將這部回憶公開出版，最後這部書也真被北京開明出版社接受出版。胡君的父親雖然很普通，很平凡，民國時期只是一個銀行練習生。可是他寫出來的這個回憶非常真實，反映了民國年間一位下層銀行職員的日常生活及其所見所聞，出版後頗受好評。筆名為「十年砍柴」的書評人認為，本書作者的人生經歷，「對那個時代闖進上海謀生的鄉下少年來說，更具有代表性」；因為在那個時代中，像他的鄉賢虞洽卿、

邵玉軒、董浩雲那樣的大亨畢竟是鳳毛麟角，而「更多的是他這樣的，平平凡凡而又自強不息，抓住一切機會改變自己命運的人」。因為這本回憶錄的出版與我的建議有點兒關係，胡兄非約我為回憶錄寫篇序言，盛情難卻，只能信手寫了篇短文，題目就叫《讓更多民間記憶進入學術研究的視野》。我在序言的最後寫道：「希望更多的讀者將自己和家庭的經歷寫下來，為後人完整全面了解過去的歷史提供一份真實的史料。」

中國文化研究所最近在進行一個口述史的項目，副所長黎志添教授專門對我進行採訪，一位研究生在旁協助錄音，我就將個人在研究所工作 20 多年的經過與感受講了出來，後來整理過的文稿就發表在本所的通訊上，題目就叫《我與中國文化研究所》，這次訪問也激起我對往事進行回憶。

2019 年是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5 月間，我突然收到香港無線電視台首席記者黎穎然小姐的來信，說她們正製作一個八集的電視記錄片《建國七十年》，其中有兩集內容涉及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中兩項重大的歷史事件，即大饑荒與「文化大革命」。他們知道我是個歷史學者，也知道我當年就在內地，曾親身經歷過那段日子，因此提出來採訪我，希望了解我的家庭和個人的經歷，「更希望了解大饑荒時期各地農村的狀況，為何當年發生大饑荒卻未能及時上報，以及『文革』時期知識分子的遭遇」。我與新中國同齡，可以說是「紅旗下長大的一代人」，大饑荒時期我還是個 10 多歲的孩子，又生活在城市裏，因此只有個人飢餓的回憶，可是 10 年後當我們下鄉時，才聽到當年農村餓死人的慘劇；而「文化大革命」則是我們這一代親身經歷的 10 年，父母親又都是民國時期過來的知識分子，曾受到殘酷的迫害。因此我覺得應該把我知道的事情說出來，讓今天的年輕人了解過去的那段歷史，於是便接受了採訪。

前幾年班上同學聚會紀念入學 40 年，事先編了一本畫冊，收錄了

各人保存的圖片，主編還讓每人寫幾句感言。記得我寫下的是：歷史的誤會，讓我選擇了研究歷史；歷史的神迷，又讓我探究誤會的歷史。

2022 年是我們大學畢業 40 年的日子，前些時班上有同學提議，讓大家動筆，寫下自己升學和在校期間的生活記錄，用以緬懷那段逝去的年華。我們這些同學既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更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作為這一巨變時代的歷史見證人，理所應當用自己的筆，記錄下自己在這期間的經歷與感悟，因此這一建議立即得到大家的響應，並陸續寫出 40 多篇回憶。

以上這些事對我撰寫回憶來說確實是個啟發，也是個動力。後來我就一直在想，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是應該將自己的人生經歷寫出來；而且要寫就不光只是寫自己，還應該將父母親這一代人的經歷寫下來，至少讓我們的後代知道他們的祖輩是甚麼樣的人，他們的一生又究竟做了些甚麼。

母親去世的比較早，1995 年冬天，父母親準備來香港看我們。那時南京沒有暖氣，冬天很冷，我們到香港後很快就買了一處很小的住房，就是希望每年讓兩家老人分別來香港過冬。那年輪到我的父母親來了，走之前父親讓母親做個體檢，沒想到一入院就查出是肝癌晚期，立即住院，我們也趕緊回南京去看望，然而母親的病情發展很快，僅僅三個月就離開了我們。母親去世幾年之後，父親又患阿茲海默症（即老年癡呆），情況一天天惡化。我們很早就移民香港，因工作關係，每年也就只能回來一兩次，而且時間很短，來去匆匆；即使他們來香港探親，每天忙於工作和家務，我也從未想到對他們作些口述，更沒意識到應該讓他們將自己的一生歷史寫下來。年輕的時候雖然也聽過父母親講些以往的家事，但並不連續，很多細節更不清楚，直到自己年齡大了，再想了解往事也不可能，為此後悔莫及。

2004 年春節，妹妹和妹夫回妹夫的河北老家探親，沒想到竟在就

要到家鄉的 20 分鐘前，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奪去了妹妹的生命！她還只有 50 歲呀，就這樣親愛的妹妹一句話沒留就永遠離開了世界，留給我們無盡的悲傷。妹妹去世時父親已經患病，但有時神志稍微清醒時老是追問妹妹到哪去了，我們只能是百般掩飾，說她出差了。後來他雖然不再詢問，但我們覺得他可能已知道些甚麼，在父親最後幾年的生命中，無疑這對他是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

2008 年 7 月 24 日，父親在南京家中安詳離世，享年 94 歲，也算是高壽了。但他因晚年患上老年癡呆，生活質量不好，我們又身在外地，無法照料，只能由兄嫂照顧，又請了兩名護工在家裏陪侍。就在當年 7 月初，我回南京探親，當時他連我都不認識了。記得是他去世前的一個多星期我要離開南京到桂林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下午去機場前向父親告別，對他說我要走了，過些時再回來看您。父親久閉著的雙眼突然睜了開來，對我笑著說：「你要走了，要注意身體啊！」我很驚喜，但絕沒想到這竟是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這很可能就是平時人們說的回光返照吧！會後我剛回香港兩天，就接到哥哥的電話，得知父親已經永遠離開我們了。

接到這一噩耗，我們一家三人趕緊購票飛回南京。父親生前單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領導到家裏來慰問，詢問我們家屬還有甚麼要求。我們感謝組織上的關心，說父親的晚年過得也很幸福，雖然最後幾年患病，生活質量不大好，但還算是平靜的，因此沒甚麼特別的要求。我只是向學校領導提出兩點請求：第一，希望南航能夠認真對待父親的歷史，1939 年他大學畢業即冒著生命危險到大後方，不是去投靠國民黨反動派，而是投筆從戎，參加偉大的抗日戰爭；1950 年他放棄香港的家庭和優裕的生活回到內地，是響應國家號召，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第二，我是學歷史的，但對父輩一代的歷史卻知之甚少，現在後悔莫及。希望組織上能夠讓我查閱父親的檔案，了解他的一生經歷。

南航的領導對我的這兩項要求滿口答應，並在學校舉辦的悼念儀式上印發了父親的簡歷，特別提到這兩段歷史的關節點。據我所知，在這之後去世的與我父親有同樣經歷的南航老師，他們的訃告上都會加上這麼一段。

然而在看檔案的問題上卻遇到一些麻煩，當時南航領導滿口答應我的請求，但因我要急著回香港上班，就未能抓緊時間去調閱。等到一年後我回家探親，又向有關方面提出查閱檔案的要求，但組織部門卻反悔了，說上面有規定，不能調閱親屬的檔案。後來我聽說是因為有家屬看了家人的檔案後，向單位提出許多政治或經濟方面的要求，他們害怕多事，就一律不讓看了。我反覆向他們強調，我查檔案絕不是為了要平反或索取甚麼經濟利益，完全是出於一個子女想要了解父輩歷史的願望。但我怎麼說也沒用，後來他們說，你可以委託一個第三者，讓他來抄閱檔案。我說第三者怎麼知道我想看甚麼資料呢，最後只能無功而返。

又過了一年回南京，這次有經驗了，知道需要迂迴解決，於是通過朋友先找到南航檔案部門的負責人，但他也只同意查看一些父親自己填寫的簡歷和自傳，有關外調和政審等部分檔案還是不給看，而且大部分要手抄，不能複印。我和哥哥一起去檔案館，經過多番爭取，終於還是讓我們複印了一些材料。

關於查閱母親檔案的故事就更有意思了。前些年因為房產事，公證部門需要查證父母親雙方的簡歷，因此要到他們原單位去複印相關資料。母親原來的單位是南京無線電工業學校，「文革」前這可是全國無線電專業實力最強的中專，若與一般的大學相比應該亦毫不遜色，但它也是「文革」中的重災區，當年的南無「八一二」在南京赫赫有名，可以說是無人不曉的造反派。「文革」後期南無停辦，大部分老師也都跟著要下放農村，因為父親單位沒有下放的任務，母親堅持了一陣，終於留了下來。以後這個學校被部隊接管，名字改了許多個，先是叫總參第

XX 研究所，後來又改為通訊工程學院，再後來又叫解放軍理工大學，現在好像又是國防工程大學的一部分。母親這批留用人員被派在不同單位，她原來一直教語文，被部隊接管後沒有教學任務，就分配到圖書館工作，一直到退休。她們這批人後來轉成在編，入了「軍籍」，戶口也從家中遷出，變成集體戶口了。然而去找她的檔案可費了好大功夫，部隊說她不是軍隊的，原來單位又不知道該找誰，最後好不容易在一個不起眼的小房子裏找到一位老南無留守處的人。那位女老師倒是非常客氣，連說「黃老師我們都認識，人可好了」。我向她說明緣由，她即找出母親的檔案，讓我複印。沒想到她又對我說：「現在又不搞『文化大革命』了，你母親去世那麼多年了，你如果需要的話，就把它拿走吧。不過你也留下電話，如果有人查的話，我們再向你要。」我一聽大喜過望，連忙留下聯繫電話，帶著母親的檔案就回家了。

看到父母親的檔案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所有的檔案中都沒有「文革」期間形成的資料。譬如父親的檔案中只有「文革」前 1965 年填寫的「歷史思想匯報」，緊接著的就是 1981 年填的簡歷了；母親的檔案也是如此，「文革」前的檔案較為完整，最後一份是 1963 年的「工資級別情況表」，再接來則是 1980 年填的「列編幹部登記表」，整個「文化大革命」的資料全都沒了。這讓我突然想起來，1982 年 8 月我剛分配到第二歷史檔案館工作時，領導上安排我的第一份工作並不是編輯歷史檔案，而是清除館中幹部的「文革」檔案。說是中央有指示，要把「文革」期間一切不實的資料全都予以清除。我當時以為這是對幹部的關心和愛護，現在想想，這不是把十年浩劫中形成的那些資料和歷史全都抹掉了嗎！

至於我個人的經歷，正好見證了共和國成長的歷史。我與新中國同齡，算得上是紅旗下長大的一代人，經歷過大躍進、大饑荒，更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當然，也享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文革」中高中畢業，算是「老三屆」，其後的命運就是上山下鄉，接下來

好不容易遇到招工的機會，又成了一名煤礦工人。直到鄧公決定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我才經過考試上了大學，又成了「新三屆」。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從事民國檔案和民國史的編輯與研究工作，在學術上剛剛有了點起色，可是沒有幾年又陰錯陽差，隻身一人來到香港，一切又都得從頭作起，個中辛苦，亦不足為人道也。

我的家庭和我自己都是平凡的，從沒有做過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但我想，正是這麼多平凡人的一生，才成就了一部完整的歷史。父母他們一代人經歷了長期的戰亂、國家的鼎革、社會的變遷，然而他們這代人卻很少有人將自己和家庭的歷史寫下來；而我們這一代更見證了新中國成立 70 年來的風風雨雨。因此我在想，確實應該為他們、同時也為自己寫點東西留下來，哪怕只給自己的家人和後代看看呢！所以最近在想著寫點回憶，先草擬了一個大綱，然後按照目錄一點點地寫。寫作期間正遇上全球疫情爆發，所有人都宅在家裏，也正好可以靜下心來寫點東西。

我把自己想寫回憶的想法告訴了哥哥和幾位朋友，立即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哥哥比我年長兩歲，經歷也與我差不多，原本應在 1966 年考大學，但「文革」的爆發使求學成為夢想，好在 10 多年後鄧公決定恢復高校招生，他才和我一樣考上大學。我隨時將剛寫完的稿子發給他看，希望聽到他的意見以便修改。哥哥雖然是學理工的，但他對中國文化、特別是詩詞造詣頗深。看到我的回憶後亦心有感觸，便寫了一首詞贈我。

清平樂·陌上草吟

七十既老，陌上青青草。孤獨一生鑽史料，豈敢自詡書稿。學童
知青礦工，誤打誤撞穀中。恰似春草覆徑，更行更遠還生。

南朝詞人江淹《別賦》中有云「閨中風暖，陌上草薰」，吳越王錢鏐寫給夫人的信中亦說「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形容的都是親人離別時依依不捨的感情。我再查維基百科，陌上草又叫陌上菜，是玄參科

母草屬下的一種草本植物，葉無柄，對生，全緣無毛。陌上草亦如其名，多生長在水邊稻田邊的阡陌之上，默默無聞地生長繁衍。我想到自己的經歷，不就像這叢在田埂上悄然生長、慢慢繁衍的陌上草嗎？雖然很是普通，但也有一道不同的風景，不如就以其作為這本書的書名吧。

回過頭來看看，我的經歷實在是太平凡了，雖然從事歷史研究這麼多年，但都是一個人默默地工作，我常笑稱自己就是個個體戶，獨立大隊，既沒有加入甚麼團隊參與集體攻關，也沒有任何學生或助手合作研究，所完成的研究成果都是個人行為；近 40 年來雖然發表了不少論著，也因天時地利，四處搜尋檔案和其他史料，但所寫文字多是從資料中發現問題，從點到線，再從線到面；敘述過程或許尚稱流暢，邏輯思維亦還恰當，卻還沒有提升到理論的高度，皆屬一家之言。至於這些回憶文字更都是些流水賬，並無生動的細節與華麗的詞彙，但都是我親身經歷的往事；文中內容或許在時間、地點或人物方面還會存在某些差錯，然而可以負責任地說，我所寫的一切全都是真實的，絕無任何誇張或虛構。我想，或許就從我這麼一個普通人的經歷和感悟中，多少可以反映出共和國成立 70 多年來的一些發展與變化吧。

潮陽鄭氏

我們家籍貫是廣東省潮陽縣（今汕頭市潮陽區）沙隴鎮興隴村，雖然我們自幼生活在外地，直到 40 多歲時才第一次回老家，但我以往填表的「籍貫」一欄中永遠填的都是廣東潮陽，甚至我的兒子也會這樣填。因為從小就聽父親多次講過故鄉，所以對家鄉還是有一點概念的。至於「天下鄭氏，系出滎陽」這句話，則是後來才有所耳聞。1988 年 12 月我回到香港後，曾在親戚的介紹下參加過幾次香港鄭氏宗親會回鄉祭祖的活動，後來也曾兩次來過沙隴的祖居地，但對鄭氏的起源，特別是我們這一支如何從中原遷徙到福建、廣東，後世又是如何延續的情形並不清楚。以下所記述的內容主要是參閱鄉賢鄭瑞庭先生撰寫的《沙隴史地風情錄》一書，於此才對家世有所了解。

鄭氏起源於鄭國，始祖鄭桓公，名友，是周厲王的幼子。周朝王室為姬姓，公元前 806 年，周宣王封幼弟姬友為鄭伯，封地在今陝西華縣西北、黃河以南，是為鄭國，故鄭伯改姓鄭，即鄭氏之始祖鄭友。宣王去世後幽王繼位，鄭友任大司徒，因鄭國地域狹小而朝政日非，鄭友遂決定率族人東遷拓展，於是在今洛陽以東、黃河以南之地營建滎陽

城，稱為新鄭。鄭友去世後，封號鄭桓公，其長子掘突繼承遺志，匡扶周王朝。在周朝後期歷史上，鄭友及其後裔曾為周王朝的中興發揮過重要作用。

鄭氏在晚周三百多年中計傳十四世，公元前 375 年，鄭國被韓國吞併，後世便開始遷於淮陽、商丘，鄭國國民便以鄭為姓，陸續向東南及江淮地區播遷。歷經春秋戰國、秦漢魏晉，鄭氏遷徙的範圍仍多在河南南部、安徽西部及湖北北部一帶。到了三十九世平難將軍、東安太守鄭文序，為避晉亂，於西晉元年（307 年）率族人渡江，定居於丹陽郡秣陵縣（即今南京市東南秣陵關一帶），是為鄭氏過江南遷之一世祖。二世元質，官晉平南大將軍、泉建刺史，因任官泉州而遷福建。至十八世鄭露，字愚叟，入唐為太府卿，再由泉州入莆田南湖，他倡導儒學，開閩粵文化之宗，故鄭露為入莆一世。及至十世鄭徽，字種德，宣和元年（1122 年）以福建鄉試解元之身份調任廣東三泊漕運貨泉轉都運使，因公務路過潮陽，見這裏山清水秀，民情淳樸，遂決定在此定居落籍，是為潮陽神山系始祖。故溯桓公封君鄭伯始，至宋代鄭徽入潮止，鄭氏計有六十六代之傳；鄭氏自十一世鄭福生遷居沙隴（這一時間據推斷應該在明永樂十三年 [1415] 左右），神山仁房得以繁衍與延續，成為沙隴一支望族，距今又有 600 餘年矣。

潮陽鄭氏分為神山、金浦和平湖三大族系，雖三系的輩序文字各異，世數亦有參差，但均屬五代陳朝名儒鄭露之後裔，而露公之十世裔孫鄭徽（1086-1151）則為潮陽神山系始祖。神山系的輩序序文以四字為句，但其中至「○錫熙良」三字之前有一字厥，據傳是因涉及帝王名號而避諱，但厥文究為何字，前人既不敢言，後人亦無法得知。鄭氏神山系輩序原傳續至康字輩第三十一世，清乾隆年間進士鄭玉珩續十六字傳輩至四十七世，光緒年間翰林鄭邦任循例又續八字，至此共五十五世。自公元 1122 年一世祖鄭徽入籍廣東潮陽之後創立神山系鄭氏輩

序，至今已近 900 年，於吾輩「會」字排行，應為鄭氏神山系輩序第二十九世，若再上溯桓公鄭伯，那就應該是九十五世了。

鄭氏神山系輩序排列如下：

種克宏通 允作君景 嘉彥仕崇 廷大明憲 與榮毓侯 茂德逢朝
○錫熙良 際會永康 宗萃和慶 蔚為國光 贊乃承烈 衍嗣興祥
宜爾之子 奕世垂芳

對於祖上的事情，到了我們這代其實一點都不清楚，只是聽父親說過高祖、曾祖這代有「寶成」與「寶泰」兩大房，而我們家是「寶成」這一房的。清末民初，在上海創業後發跡的先人在家鄉興建了一種仿照上海的里坊式建築，即以祖祠家廟為中軸線，兩邊建有四點金或下山虎厝四座，被稱為「駟馬拖車」，其中寶成的祖居就叫「綿德里」。小時候就聽父親說過老家的祖宅三座落、下山虎、四點金甚麼的，當時一點



1993 年第一次攜妻子回老家，攝於祖宅門前，上方匾額為「榮祿第」

概念都沒有，後來才知道這是家鄉的一種建築風格，「下山虎」即兩上房、兩偏房、一廳、一天井，「四點金」多兩房，「三座落」則多四房兩廳。20 多年前我第一次回到沙隴老家時，家鄉的宗親還帶著我去看過「寶成」的故居綿德里，不過那裏當時仍是鎮政府的辦公地點，後來才落實政策，還給留在家鄉的後人。

沙隴鄉民素有開拓進取、奮力拚搏的精神，所謂「日出沙隴鄭，日落錢家寨」，說的就是沙隴鄭氏在當地稱雄一方的情形。潮汕地區因為地理條件和風俗文化的影響，具有崇尚經商、吃苦抱團等傳統，但由於地少人多，清政府長期以來又實施閉關政策，所以經營走私貿易就成為本地的一個主要行業。鴉片戰爭之後，上海開埠，沙隴鄉民紛紛北上江滬，在上海紮根發展，創建商行，開辦錢莊，設立典當，經營房地產，沙隴當地人就將這些到上海闖天下的商人稱為「上海客」，而鄭石仁、鄭石部兄弟兩人創立的「寶成」和「寶泰」就是其中佼佼者。鄭石仁去世後葬在沙隴後坪寨前旗地，碑文上書「戶部員外郎壽山鄭公，神山仁房二十五世」，更有前清東閣大學士陸潤庠題贈柱聯：「朝有印，案有琴，通德門庭期光大；辰帶壇，砂帶曜，胸山世澤卜綿長。」

前不久在網上查到一篇文章，說的就是沙隴鄭氏在上海開埠之初奮發創業的情形。光緒初年，鄭石仁到上海謀生，先是與其子在英租界的沙遜洋行當捐客、買辦，發跡之後進而開辦「寶成」號商行。寶成家族在上海主要經營典當、錢莊和房地產業，同時還在漢口、九江、鎮江、蘇州、南通等長江沿線城市擁有多處房產、錢莊和當舖，成為以上海為中心的財團大戶，而寶成就應該是我高祖鄭石仁在上海創業的根基。

有朋友幫我在《申報》上查到 1894 年的一則消息，說的是「法大馬路和興押店主翁阿乾前日投捕行，控稱素與鄭寶成、鄭寶泰土行主鄭熙炎、熙澄昆弟往來存洋三千餘元，按月付息，毫無尾欠，迄今十餘

年，獲利已過於本。上月杪忽聽翁阿華唆使將押店，強壩[霸]據為己有，將我逐出，不容進門。請為提究。捕頸以世間無此情理論，俟堂期赴公堂遞稟請辦」云云。如此看來，鄭熙炎應該就是我二十六世的曾祖。

祖父與父輩

我的祖父鄭伯文（他是良字輩的長房，估計伯文是字，後以字行，反而真名叫甚麼都不知道了），生於光緒十年（1884），年輕時應該就跟著父親在上海做生意。雖然全家常居上海，但主要的生意卻是在北方，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祖父在直隸泊頭經營的一家蛋廠遭到戰火毀壞而破產，心身焦慮，患了一場大病，不得已攜家人返回故鄉。數年後他又東山再起，這次則主要是在九江、上海一帶經售精鹽和雜糧之類的買賣，聽說他在九江還有一些房產。從我父親的檔案中得知，祖父大革命時期曾加入過國民黨，但應該沒有參加甚麼活動，也從未擔任過甚麼職務。父親在自傳中寫道，雖然潮州人崇尚經商，但祖父卻一直支持和鼓勵父親讀書，後來生意不如以往，然而在經濟上仍資助父親上大學。抗戰爆發後他的生意再次受到打擊，從此回到老家再無外出，憑著以前購置的二、三十畝田地租金過日子，而父親的學費就都由他大哥全數承擔了。

我的祖母周氏比祖父大兩歲，我出生時他們都在香港，肯定見過我這個孫子，當然我是一點印象都沒有了。祖父祖母後來在香港生活，主要靠伯父與姑媽接濟，雖然經濟狀況大不如前，但都能安享晚年。祖父去世時 84 歲，祖母一直到 92 歲才去世，這在六、七十年代都算是長壽了。然而我們家自「文革」前即主動與香港的眾位親友斷絕了通訊來往，一直也不知道祖父母和大伯去世的消息，自 1950 年初父親返回內地後就再也沒有見到父母，直到 1985 年他和母親第一次回香港探親，



祖父與祖母

才在二姑的陪同下去拜祭他們。我們一家回到香港後，每年的清明和重陽都會到位於九龍城附近聯合道的華人基督教永遠墳場去掃墓，為祖父和祖母獻上一束鮮花，感念他們生育和培養父親之恩。

祖父祖母一共生了五名子女（年幼夭折的不在內）：大姑御鍵、大伯際雄（潮汕人「際」、「志」同音，後來一直叫志雄），父親際睿、二姑碧雲、四叔際筠，庶出的子女有三姑（不知道叫甚麼名字）、五叔際蔚和六叔際典。

潮州人崇尚經商，因此我的叔伯一輩大都是生意人，但是父親從小就喜愛讀書，祖父母和大伯也都一直支持並供養他上學。1924年前後，因受到軍閥戰爭的破壞，祖父生意失敗，設在泊頭的蛋廠倒閉，以致家道中落，大伯志雄便輟學經商，在上海的德商美最時洋行（C. Melchers GmbH & Co.）學生意，先是當跑街，就是四處推銷商品那種，後來有了些資本就自己創業，開了一家雜糧行，但在「八一三」淞滬抗戰中，因囤積在浦東棧房的存貨毀於戰火，生意失敗，只好又重新回到美最時洋行，擔任該行酒精棧房的經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後，大伯脫離德商洋行，和朋友合資到香港經營進出口貿易，生意越做越大，聽父親說大伯當時在緬甸購進一批汽車輪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這批輪胎價格猛漲，他不僅賺了不少錢，而且還因幫助英

軍運輸受到嘉獎。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淪陷，大伯又回到廣東，在興寧一帶經商，亦從事過美金公債的異地買賣，從中賺取差價。抗戰勝利後他再回到香港，住在香港的跑馬地，祖父母等一大家人都由他供養，那時他的生意很紅火，家中還有私家車。聽親戚說50年代初他的資金大都放在廣東的一個生意夥伴手中，沒想到在內地開展的「五反」運動中那個人被定為不法商人，資金被沒收，伯父的資金鏈斷了，家境頓時一落千丈，雖然後來他也曾想要重整旗鼓，但終究未能翻身。大伯先後有三個妻子，共生養了九名子女，除了大家姐已去世，其他的堂兄妹們都在香港和美國生活。

四叔際筠亦因祖父當年生意失敗而輟學，原來他跟大伯一起做生意，可能是後來兩人之間發生了一些爭執，自己跑到泰國還是寮國（即老撾）單幹，但也沒有成功，很早就去世了。他的長子會義原來在老撾的首府萬象上學，後來到台灣讀高中，再去美國留學，很是艱辛。大學畢業後他就留在美國工作成家，記得很早以前他還與父親有過聯繫，但後來音訊全無。1953年四嬸獨自一人離開潮州前往老撾時曾在鄉下留下一個女兒潔蓮，年齡應該和我差不多大，後來就由他們家的黃姓佣人一直養大，成了他家的養女。越戰結束時四叔已經去世，四嬸和她身邊另一個女兒楚凡四處流浪，後來以難民身份到了美國加州，據說生活得還不錯，但與鄭家再也沒有甚麼聯繫。

大姑御鍵年輕時因為生下的孩子夭折而被丈夫遺棄，祖母捨不得她在婆家受苦，便將大姑接回娘家。她一輩子沒有子女，孤苦伶仃，名義上雖然有一個乾兒子，但從未有過甚麼贍養。大姑新中國成立後一直住在老家，因家中有祖宅和一些田地，祖父母當時都在香港，土改時她就被抓起來吊打，吃了不少苦。1953年我們全家已遷到哈爾濱，妹妹即將出生，父親就想辦法寫報告，申請將她接到哈爾濱。大姑也真不簡

單，雖然有一點文化（初小水平），居然能一個人從潮陽縣的鄉下到汕頭，再到廣州，然後千里迢迢，一路轉車，終於來到哈爾濱。在這之後大姑就一直同我們一家生活在一起，所有家務事都由她全權決定，是我們家的掌門人。1983年二姑從香港到南京來看望我們，她們兩姐妹才得以重逢。二姑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在她的勸化下，大姑也皈依教會。1984年2月，大姑去世，那年她正好80歲。

二姑碧雲生於1921年，年輕的時候在老家和九江讀過書，應該是讀到高中，這在當時廣東，一個女孩子能接受到這樣程度的教育算是不容易的了，這也說明祖父祖母的思想還是很開明的。二姑的第一個丈夫是印度中國銀行的職員，結婚未久便因騎馬墜落而意外去世，留下一個遺腹子。這對二姑的打擊很大，此後她篤信基督教應該與此有關。後來她在香港認識了二姑夫，他也是潮州澄海人，剛從內地來到香港，因為他懂得一些醫術，卻沒有證書，二姑身上有些錢，便代他在九龍城寨買了間門面房，以後就在這個三不管的地區行醫，在當地還是挺有名氣的。二姑與姑父又生了四個子女，除了表妹早年移民加拿大外，其餘幾個表弟都在香港。1988年6月我第一次回香港探親，就是住在二姑家，也是她老人家成天陪著我在香港四處遊覽，看望各位親友。當年年底我正式回香港定居，最初也是住在二姑位於九龍城嘉林邊道的家中客廳，當了一名「廳長」。姑父一家人待我十分熱情，幾位表弟表妹連同家人待我親如兄弟，這麼些年來經常來往，每年過年過節更要在一起團聚。如今姑父姑母二位均已蒙主寵召、榮歸天國，但我們全家都永遠緬懷他們當年的一片熱心。

以前我們一直沒有聽說還有個三姑，因此對她的情形一無所知，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她與五叔、六叔都是庶祖母所生，兩個弟弟年幼，就跟著祖父母一起來香港，她就留在鄉下，聽說後來吃了不少苦。三姑的兒子也就是我的表哥，早年在海南島開荒，生活太艱苦，後來就



父母親與姑父姑母（左一左二）

回到沙隴老家，也改姓鄭了，後來家中祖宅因老家落實華僑政策予以歸還，因為我們這一房所有後人都不在家鄉，祖屋就由他們繼承了，記得香港的親友們還出了些錢幫他們修葺祖屋。

五叔際蔚和六叔際典是我們最小的兩個叔叔，他們的年齡甚至比大伯的長子長女還小。1949年前後他們隨祖父母一起到香港，但他們的生母還留在鄉下，直到1963年五叔才將其接到長春，十多年前去世，享壽102歲。1950年初我父親決定回內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時，五叔也想讀書，但在香港沒有機會，於是不久也跟隨父親回到北京，先是補習了一段時間高中的功課，後來考入父親單位重工業部屬下的重工業學校。畢業後分配到剛剛成立的長春中國第一汽車製造廠。他後來又在工作中上了汽車廠的夜大學，獲得大學畢業文憑，從技術員一直做到鑄造分廠的高級工程師，算的上是「一汽」的建廠元老。五嬸和兩個子女也都是「一汽」的職工，可以說五叔一家是「一汽」世家。五叔為人忠厚老實，動手能力很強，又喜好攝影，我們家的很多照片都是他拍攝

的，但他也太老實，可以說是一輩子被人利用而不被重用。他退休後曾受聘廣東一家私營企業，也是因為太老實，老闆並未履行原先承諾的條件。五叔長期在鑄造車間工作，身體一直很好，沒想到前些年患前列腺癌，又被醫生誤診，延誤了治療時間不幸去世，如今五嬸就是我們上一代中唯一一位長輩了。

至於六叔，因為他是最小的孩子，自小就受到溺愛，長大之後不務正業，無所事事，終生未婚，從未有過正當職業。我們也只是聽父親說過有位六叔，但從來沒見過面，多年前五叔要找他，想帶他回長春見見母親，我們也曾託香港警局的親戚查詢他的下落，最終也沒有結果，估計他早已離世了。

黃氏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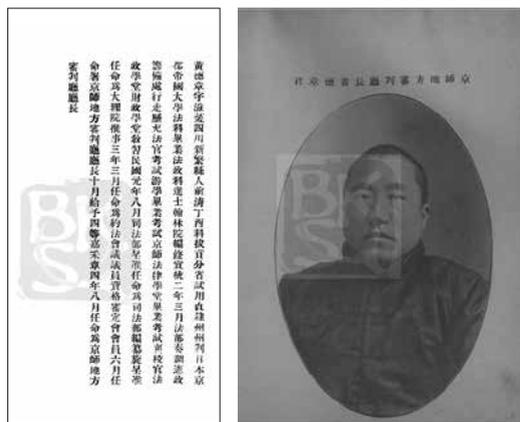
相對而言，對母親的家族史我們就更加不清楚了，只知道她的祖籍是四川新繁，應該算是官宦和讀書人世家。也有傳說黃氏祖籍在廣東梅州府，「湖廣填四川」之後，先祖率族人向西遷徙，逆江入川，涉途艱辛，不為人記。因動身遷川時間較遲，沿途良田均為前人據佔，乃穿越巴山，突兀得見平原，就此於茲定居，此地即為成都府附近新繁縣之龍橋。從二舅家看到一份家族的族譜，那是一首五言詩：「雲中懋先德，光輝遠嘉祥；孝敬傳家寶，賢才輔國良。修齊承克讓，平志振安邦；一本崇仁義，萬枝發達長。」我母親是「輝」字輩，按照這部族譜排列，只能追溯到前七世，母親的一世祖至五世祖分別應為黃雲桂、文中、懋珊、柎先、德章，再前的就不知道了，因此這個家世肯定是不全的。

母親出生後不到一年，她的祖父黃德章（字滋菱，一說滋萱、子宣，應該出生於1870年前後）就去世了，因此在她腦海中沒有任何印象，後來只是零星地跟我們說了些祖父（我們應該叫太外公）的情形。

按照母親的說法是，他在鄉間已經中舉，再負笈進京，因此便率全家人離開四川的新繁老家，其後就永遠離開故鄉，於北京定居。晚清科舉廢除後他被公派留學日本習法律，回國後殿式獲第一名，稱為「洋狀元」，其後太外公一直在法律界工作。

最近我查閱相關資料，並得到朋友的大力協助，對太外公的情形有了深一層的了解。據現有的資料得知，他應該是丁酉年（1897）由四川省選為拔貢，保送至京城的國子監，分省試用直隸州州判。入京後第二年就遇上戊戌變法，遂入剛剛創建的京師大學堂習英語、歷史，後曾擔任過翻譯。晚清新政期間考取首批官費生，留學日本，於京都帝國大學學習讀法律，尤以民法為重，他在日本留學期間曾發起創辦《學海》雜誌，頗具影響。光緒三十四年（1908）學成歸國，查閱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1908年10月16日）《申報》刊載奉旨「此次驗看之學部考驗游學畢業生」一則消息，其中黃德章著賞給法政科進士。第二年即宣統元年五月（1909年6月）留學生參加廷試，據《申報》1909年6月5日載：「此次廷試游學畢業生，奉旨派梁敦彥、唐景崇、嚴修、朱益藩為閱卷大臣，章宗元、嵇鏡、曹汝霖、何燏時、程明超、羅振玉為襄校官」，「應試之留學生共計一百零二人，昨已由閱卷大臣在內廷評定試卷，分為一、二、三等，已於十三日早進呈御覽後，即在憲政館拆封寫榜，午後十二點鐘在學部照牆張貼」云云，其中一等三十名，二等五十七名，三等十五名，我的太外公黃德章名列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編修。這在以前的科舉考試中那就是狀元呀！但此時早已廢除科舉，故時人稱他是「洋狀元」。據說《清史稿》上有記載，但我沒去查閱。

在這之後太外公由法部調任憲政籌備處行走，歷任法官考試游學畢業考試及京師法律學堂畢業考試襄校官，法政學堂、財政學堂教習等職。1911年清政府欲將川漢鐵路收歸國有，從而引發川省士紳的抵制和抗議，掀起一場「保路運動」，直接導致辛亥革命的爆發。太外公本



現存史料中太外公的照片和簡歷

是四川人，他和在京的一些川籍官員經常集會，聲援川省保路計劃，結果為人舉報給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密報「京官反對鐵路國有、函電煽動川省保路會」。在這份黑名單中，太外公黃德章的名字赫然在冊，這在《盛宣懷檔案資料·辛亥革命前後》第3輯中有記載。

民國成立後太外公先被任命為司法部編纂，旋任大理寺推事，1914年3月，任約法會議議員資格審定會會員，6月署京師地方審判廳廳長，10月，授四等嘉禾勳章，次年正式出任京師地方審判廳廳長。《成都法治史話》載，黃德章因執法嚴明公正，剛正不阿，屢屢遭到權貴打擊。當時財政部官員貪贓枉法，積弊甚深，財政總長陳錦濤被告至地方審判廳，大總統黎元洪、國務總理伍廷芳及張勳等高官紛紛來向他求情，卻遭到他的嚴辭拒絕，雖說此舉得到民眾的齊聲讚譽，但最終還是遭到權貴的忌恨和報復，被貶職外調。

據《民國職官年表》載，黃德章於民國九年至十一年任江西省高等檢察廳檢察長，1922年2月1日該職由李杭文署任。聽黃家老輩傳言，太外公是在20年代初因患「背瘡」而辭官回到北京，住在香爐營二條，不久便因病去世，終年應50餘歲。太外公去世的消息在民國十二年9月16日北京出版的《法律評論》上有記載，稱「大理院民四

庭推事黃德章曾任江西高等審判廳廳長，在法界素負盛望。入夏以來，身體多病，已於本月九日病故，殊可憫也」，因此可斷定他去世的時間是1923年9月9日。

我的外公黃藜光（字乙青，1893-1953）是長子，生母在他年幼時就去世了，所以幾位弟弟都是繼母所生。根據朋友幫忙查到的一些資料我才知道，外公應該是1917年畢業於北京工業專門學校電機科，後來該校合併到北京大學工學院，因此也可以說是北大的校友。1917年3月20日的《申報》上刊登交通部分發各部實習名單中有他和其他6名同學分配到京奉鐵路實習的消息，1919年中華全國鐵路協會主編的《鐵路協會會員錄》刊載他的工作單位是京綏鐵路南口機廠，而民國二十五年平綏鐵路管理局登錄外公的職務是平綏鐵路局機務第四段段長，機械幫工程司，工資級別為三等四級。

因為太外公去世較早，所以外公很早就承擔起全家的生活重任，不單他自己有八個子女，還有繼母和幾個同父異母的弟弟都需要他供養。聽母親說外公長期在鐵路上工作，月薪有二百多塊大洋，這薪水在戰前物價平穩時期還是挺高的，但家庭負擔卻很重。外公是個讀書人，雖習工程，但對中國古典文學素有修養。他為人生性懦弱，不問政治，一直在鐵路上工作，先後服務過京綏、浙贛、成渝等重要鐵路幹線。抗戰爆



外公與外婆

發後，大舅、二舅、母親和四姨都先後來到大後方求學，外公和外婆亦於 1943 年年底率其餘子女從北平來到重慶，外公在交通部找到一份工作，此時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工資收入更是大幅下降，但還是得依靠他一個人的微薄收入，支撐一大家子的生活。然而就是這樣，外公不僅將幾個弟弟和眾多子女培養成人，而且都接受了高等教育，真是不容易。新中國成立後外公一個人在重慶，任成渝鐵路局機務科工程師，1953 年因患高血壓病而猝死，去世時身邊竟無一位家人，後來還是八叔公和五舅從成都趕去處理後事。外公的原配生了大舅後就去世，因此我的外婆是繼室，她共生了七個孩子，她叫郝叔冲，母親的自傳中說她曾唸過女子師範，在那個時代是極為罕見的，這就說明外婆肯定也出身於一位有地位的士紳家庭。因為生育子女太多，外婆也與那個時代絕大多數女性那樣，一輩子就是相夫教子，從未外出工作，1955 年因患心臟病於北京去世。

以往因醫療條件，孩子出生後能長大成人的並不是很多，因此外公這輩沒有聽過其他幾位叔公或姑婆，只知道有老四、老七和老八長大成人。四叔公黃藻光是外公繼母（我們應叫太外婆）的長子，1934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曾任天津、濟南等市的地方法院推事、書記員等職，抗戰勝利後經外公介紹，到長辛店鐵路機車修理廠任職員，以後就一直居住在那裏。不過我們家對他的情況不是太了解，只知道他家子女較多，生活比較清貧。

七叔公黃茂光（1916-2007），北京師大附中畢業後於 1934 年考入清華大學工學院機械系，1939 年畢業，即留校（那時清華已與北大、南開合併為西南聯大了）任助教。1944 年他考取留學美國庚款（航空工程）獎學金，並於 1945 年前往美國留學，同行者有楊振寧、何炳棣等 20 餘人。10 多年前我曾分別問過何、楊兩位教授，他們都清楚地記得他，何教授那本《讀史閱世六十年》中亦有當時獲得庚款留學生的

名單。七叔公先獲麻省理工學院碩士，後又於 1951 年獲康奈爾大學博士，隨即便準備回國，船票已經購好，但當時中美關係極為緊張，美國移民局不准他離境，不得已他就先留在美國的大學任教，一直到 1954 年中美日內瓦會談後美國才對部分中國留學生放行，他終於在 1956 年 1 月回到北京。

回國後七叔公先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和研究員，1958 年中國科技大學創辦後他又兼任該校教授，後來乾脆就把他調到科大了。他回國後才結婚，那時已逾 40 歲，因此他的兩個孩子都很小，但卻大我一個輩份。七叔公家先是住在中關村科學院的 10 號樓，1965 年暑假我到北京去，曾多次去過他家。1969 年中國科大遷出北京，他也隨科大搬到合肥，直到「文革」結束後才調回北京，住在 15 號樓，這是一幢灰磚、黑瓦、朱紅色木窗的住宅樓，就是被稱為「特樓」的其中之一。當時住在那幾幢樓的都是從海外歸來的科學家如錢學森、錢三強、趙忠堯、趙九章、貝時璋、郭永懷等等，現在這幾幢大樓已經成為歷史文物，不許拆遷了。

我從沒有問過七叔公為甚麼回國，但我想他是個孝子，最大的原因應該是要回來照顧寡居多年的母親。「文革」中他也飽受迫害，1969 年科大遷出北京後我曾到合肥看望過他們，當時他還在磚瓦廠燒磚呢！1972 年中美外交關係解凍後，一批批美籍華人科學家回國訪問，聽說有以前的同事或同學（好像是王浩）提出要見他，但他拒絕見面，理由是：見面說甚麼呢？七叔公是著名的固體力學家，共培養過數十位碩士和博士生，2006 年，他的多位博士生為他出了一部慶賀 90 歲的祝壽文集，他也送了我一本。他與我父親的研究領域應該相近，但我卻完全是個外行。文集的最後附有七叔公一生的論著目錄，或許別人沒注意，而我看了之後卻十分感慨，看到他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在美國頂尖的期刊上發表過多篇論文，再接下來就是 70 年代末以後發表的一系列

論文了。你想想，一個科學家在他一生最寶貴的黃金時代中竟然沒有發表一篇論文，這究竟說明了甚麼？

2016年9月的一個周末，原中國科學院力學所和科技大學的一批老人在北京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為七叔公舉辦了一個百歲誕辰的紀念活動，他們都是七叔公過去的學生和同事，如今也都是八、九十歲的老人了。我當時正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參加一個會議，力學所離北大很近，那天上午我又沒有報告和評論的任務，所以就溜會參加這個紀念活動了，在會場上見到七叔婆和她兒子黃圍一家人（女兒黃因一家在美國定居，沒有回來）。前一年春天我和妻子到北京見到七叔婆時她身體尚可，中午還一起外出吃飯，一年不見，她已需要坐輪椅了，沒想到這竟是最後見的一面，第二年她就去世了。那天會議的組織者邀請我作為親屬說幾句話，我就將看了文集後的這些感慨說了出來，很顯然，與會者過往都沒想過這個問題，我想他們聽了我的這番話，一定也會深有感觸的。

八叔公黃蔚光（1918-2006）是外公最小的弟弟，他生於北京，先後畢業於北師大附小和北師大附中，高中時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1936年高中畢業後曾報考北大、清華、浙大和北洋大學，亦均被錄取，但因他參加過學生運動，為了躲避當局的迫害，只能到天津入讀北洋大學土木工程系。盧溝橋事變後北平淪陷，北洋大學西遷至陝西，後在新組建的西北聯合大學完成學業。大學畢業後先留校任助教，後經老師介紹到重慶公路局、重慶鐵路局工作，任工程師。新中國成立後調入西南鐵路工程局（後改組為鐵道部第二工程局），相繼參加成渝、寶成、川黔、成昆、湘黔等國家重點鐵路的建設，歷任工段長、工程師、施工科長、主任工程師、高級工程師等職，積極投身國家鐵路的建設，長年奮鬥在西南偏僻的鐵路工地。直至70年代中為照顧家庭，才調至鐵道部二局下屬位於成都的鐵路專科學校，任綜合教研室主任，直至退休。

八叔公年輕時是一熱血青年，積極參加抗日愛國運動，「一二·九」運動後他參加「南下宣傳團」南下，大學時期先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並於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聽他的子女說，他有個中學同班同學叫劉植岩，當年一起參加革命，後來劉去延安，還是八叔公親自前往送行。劉植岩新中國成立後先在北京工作，後調到成都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兼組織部長，「文革」初被迫害身亡，八叔公雖然家在成都，但聽說兩人並未見過面。說到劉植岩大家可能不大熟悉，但他的兒子就是當今主管中美貿易談判的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1941年前後因中共西北地下黨執行「隱蔽精幹，長期潛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八叔公從此與組織失去聯繫，雖然他一直參加進步活動，卻終未獲黨組織的承認。新中國成立後黨組織給他的結論是「自行脫黨，但無任何危害黨組織的行為」，直至1979年才重新入黨。八叔公一直不願提及年輕時的這段歷史，他的子女也不是很清楚。八叔婆與我母親和四姨年齡相仿，年輕時彼此間多有來往，但她後來身體一直不太好，因此八叔公也很少外出，直到80年代初他到南京來招生，我才第一次見到他，1998年我們全家去九寨溝旅遊，在成都又見到他和八叔婆。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是2005年我到成都開會，專程抽空去家裏看望他，那時八叔婆已經去世，他的身體也不是太好，但沒想到這竟是最後一次見面，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八叔公有兩個孩子，女兒輝緜，「文革」前考入西南師範學院（今西南大學）歷史系，因為八叔公在鐵路工作，家屬每年可享受免費車票的待遇，所以暑假期間經常外出，1965年暑假我就和她在北京見過面。「文革」中她大學畢業，分配在四川宜賓地區的南溪縣鄉下教書，「文革」後好不容易才調回成都，一直在鐵二局下屬的第一中學教歷史，評為高級教師，也是學校的領導。她的先生姓魏，「文革」期間畢業於重慶大學，後一直在成都的省機械研究設計院工作，擔任高工及設

計院助理院長。兒子輝經，比我大一歲，1969年初到四川的渡口（就是今天的攀枝花）插隊，因為他是鐵路局的職工子弟，1972年就被招工，抽調到湖南的懷化修建湘黔和枝柳鐵路，經培訓後從事醫務工作。他是老高二，底子很紮實，恢復高校招生制度後準備參加高考，卻因當地和本單位的土政策不讓報名，而錯過時機，直到80年代初才調回成都，任鐵二局中心醫院放射科主任。雖然我們從未見過面，他的輩份也比我長，但因二人年齡相仿，經歷又差不多，所以下鄉後我們倆常有信件來往，但直到80年代初他到南京的鐵道醫學院培訓時我們才見面。在南京學習的一年中輝經常常到家裏來，彼此交談插隊時和工作後的經歷，雖是初次見面，但已神交多年，非常投緣。

母親的兄長與弟妹

大舅黃輝宙（1917-2000？）出生後不久母親就去世了，自幼在北平上小學和中學，他與我的七叔公年齡相仿，也是師大附中的同班同學，1934年同時考入清華大學，不過他讀的是土木系。抗戰爆發後大舅隨學校南下，我曾在西南聯合大學史料文獻的「長沙臨時大學應行發給甲種赴滇就學的名單」中查到他的名字，同行者還有任繼愈、丁則良、查良鏘、季鎮淮等人。大舅1938年畢業後，抗戰期間一直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工程委員會工作，任工程師、工務主任等職，戰後曾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專員，新中國成立後先是在上海華東工業部設計公司工作，後調往北京，任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一設計院高級工程師。印象中我只見過大舅一次，是他到南京出差，但甚麼時間已經忘了，大舅媽好像從未見過。聽母親說，大舅媽對大舅不好，特別讓人奇怪的是，大舅媽對自己兩個親生兒子的態度完全不同，對老大寵愛有加，對老二則不聞不問，甚至可以說是百般虐待，連後媽都不如。然而陰錯陽差的

是，黃家的好處最後都讓老二攤上了。因為老大在山西插隊，比較早就調到縣城工作，老二年幼，則隨父母全家一同下放到蚌埠。後來一機部有個上大學的名額，說是可以照顧機關子弟，因老大當時已抽調在縣裏並安排了工作，老二就成為最後一屆的工農兵學員，上了同濟大學的建築系，畢業後又以照顧父親的理由分配到北京一機部第一設計院，與他父親一個單位。本來這就是命運的安排，與老二沒有任何關係，但他媽媽卻把所有怨氣全都撒到他頭上，世上竟有這樣的母親，真讓人唏噓不已。

二舅黃輝實（1921-1991），抗戰爆發後就讀於西南聯大經濟系，1938年在昆明讀書時曾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任雲南羅平縣委書記，不知為何後來脫黨，轉到雲南大學上學。二舅在聯大讀書時非常活躍，因在話劇中飾演阿Q而出名，聯大的老人談起阿Q可以說無人不知。二舅雲南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在企業工作，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在申新紗廠任高級職員，新中國成立前夕參加了民主建國會，「文革」前一直在上海市棉紡同業公會任主任秘書，曾採訪過眾多當年的資方代表人物，採訪內容涉及到各行業的興衰、「五反」及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等方面，我曾聽他講過，但不知這些資料後來的去處，現在想起來，這可是一批珍貴的史料。「文革」中他雖然也受過審查，但主要還是脫黨的問題，沒有受太大的罪，後來好像參加過翻譯內部參考書的工作。

我下鄉插隊後曾有一次去上海，並在他們家過年，那時表姐和表哥因病都沒有下鄉，但也沒安排工作，因此與二舅全家接觸的時間比較長。他們家晚上經常有不少客人來訪，大家在一起交談些對時政的看法，對我而言確實是增長了不少見識。「文革」後二舅調到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在那段時間撰寫了《旅遊經濟學》《旅遊營銷學》等多部旅遊經濟學方面的專著，他提出發展旅遊資源的「六字七標準」，即從旅遊資源本身來看，應重視「六字」，即「美、古、名、特、奇、用」，而評價資源所處環境時，則要考慮到「季節性、環境污

染狀況、與其他資源的聯繫性、可進入性、基礎結構、社會經濟環境和客源市場」等七個標準，這些建議對於改革開放後國家推動旅遊業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應該算是中國旅遊經濟學的開創者，因此退休後還經常被各個旅遊城市邀請過去出謀劃策。然而二舅一直為他年輕時脫黨一事煩惱，新中國成立後多次要求組織上審查，並希望恢復黨籍，但最後好像也只是同意他重新入黨。1991年6月29日是舅舅的七十歲生日，上海社科院及經濟所的領導到他家祝賀，他很高興，還和大家一起照像，沒想到當晚就與世長辭。舅媽竺淑貞比舅舅大兩歲，也是舅舅西南聯大的同學。她的父親是銀行家，好像是浙江興業銀行的經理，二舅媽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在華東師範大學地質系任教，當過系主任，專業方向是港口建設之類的，在舅舅去世二年後，她也追隨他一起走了。

我母親黃輝家是老三，她的經歷後文單獨講。

四姨黃輝容（1925-1947），1943年在師大女附中高中畢業後，即與我母親一起從北平走到成都，先借讀於東北大學，第二年以同等學力考上燕京大學外文系。四姨身體瘦弱，頭髮有些發黃，同學們都叫她「黃毛」。燕京大學是個私立的教會大學，學費較為昂貴，學生的家



母親（右二）與外婆、大舅（左一）、二舅及七姨（右一）、八姨（中）合影

庭至少是中產以上的階層。然而燕京的學生思想左傾的人卻很多，在校內組織了許多追求民主自由的如「可犁」、「新蕾」、「啟明」等團體，他們親眼目睹中國百姓的貧窮，親身經歷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因而嚮往民主和自由，厭惡專制與腐敗，歡呼和擁護暴力革命，我四姨就是其中的一個激進青年。她在學校期間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在成都「11.11」示威遊行中異常活躍，她還參加「海燕劇社」，在話劇《放下你的鞭子》中飾演那個流浪街頭的小姑娘，在《歲寒圖》中扮演黎醫生的女兒，一位天真純樸的善良少女，她們還組織「時事座談會」、「讀書會」等各種活動，積極爭取民主憲政。

抗戰勝利前夕，燕大的中共地下黨員告訴四姨，說她身份已經暴露，組織上要她和一批同樣已暴露身份的同學到解放區去。結果她沒有通知家人，就和燕大、川大和中央大學的幾位同學悄悄地離開成都，先到重慶，並於7月中徒步走到鄂豫邊區（鄂北四盤山漿溪店）新四軍五師的駐地，先到青年幹部班集訓，其後分配到《七七日報》社當記者，此時她已改名叫黃琪。

1946年2月，中原軍區成立了中原民主建國大學，對象是剛到解放區的知識青年，四姨又被調去參加學習，編入一隊，駐地就在宣化店附近的陳家灣。同年5月，國共內戰爆發在即，位於湖北宣化店的中共中原軍區首當其衝，中原大學解散，組織上要同學們化裝轉移，但四姨卻堅決要求留在部隊，後被分配到一縱文工團。6月26日中原突圍開始，7月1日，一縱在湖北孝感王家店附近突圍成功。在渡襄河之前，文工團解散，四姨分到三旅九團任祕書，當時四姨已與九團團長、一位老紅軍周凱結婚。其後又成立鄂西北軍區，三旅劃為第三軍分區，周凱任軍分區副司令員，四姨仍任祕書。

1947年1月，國民黨軍隊大舉圍剿鄂西北軍區，四姨奉命率部隊突圍，四姨當時已懷孕，1月22日，四姨在房縣兩道河附近被重重

包圍，腿部中槍，身負重傷（一說被炮彈擊中），但她仍赤手空拳與敵搏鬥，最終國民黨軍抓住她，竟將其殺害，並把頭顱割下掛在樹上，極為殘忍。據後來被俘的一名國軍排長日記中記載，說圍剿共軍數月都沒有蹤跡，結果「只打死一個女人，而這個女人竟敢搏鬥，真是不怕死，令人不可思議」。以上這些內容主要摘自四姨的戰友李嘉陵撰寫的回憶，刊於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湖北省婦女聯合會合編的《中原女戰士》[中輯]（中國婦女出版社，1992年）。

後來聽說姨夫為此親率戰士，要去搶回四姨的頭顱，結果說是違反軍紀，受到處分。新中國成立後外公全家四處打聽四姨的下落，可是一直沒有任何音訊，後來終於得到她已犧牲的消息，外公家門上掛著「光榮烈屬」的牌子，就是因為我四姨的犧牲換來的這個榮譽。姨夫新中國成立後也一直在尋找四姨家人的下落，但一直沒有消息，後來他與另一位烈士遺孀結婚，但心中一直沒有忘記四姨。他本人因違反軍紀受到處分，降級使用，很早就轉業，在鐵路二局擔任一個處級幹部，沒想到他就和我的八叔公在一個單位工作，雖說不熟，但彼此也認識，然而怎麼都沒想到，兩家竟還有這麼一層關係。直到1985年初，輾轉通過朋友和戰友的介紹，周凱終於聯絡到二舅和我母親的地址，彼此間才建立了聯繫。從他1985年2月的來信中得知，他是四川通江人，1916年生，1932年參加紅軍，參加過長征和抗戰，是一位久經沙場的老革命。1946年經組織批准與我的四姨結婚，但僅僅半年之後，四姨就犧牲了。周凱與我們家聯繫上便急著要到上海、南京與舅舅和我母親見面，正巧父母親那時正在香港探親，未能在南京接待他，等他們回來後專程到成都和周凱一家相見。周凱雖然早已另外組成家庭，但還是稱我母親為三姐，兩家之後經常走動，這也是大時代中一個家庭的命運吧。

1986年10月，中央和南京市的黨史部門為了紀念南京梅園新村撤離40周年，特別在南京召開了一個紀念大會，邀請當年梅園新村中

共代表團的部分成員出席，其中有好幾位就是我母親和四姨她們的同學和朋友，記得參加會議的有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一位姓楊的台長，社科院美國所一位姓龍的副所長（後來的名字叫吳展），以及外交部辦公廳主任陳浩。據我母親說他們都是當時在成都的同學，甚至以前在北京就是同學，譬如陳浩（原名陳寶靜，長期跟隨周恩來工作，曾任周的祕書）就是中學時期的同學，與母親與四姨都很熟。母親曾對我說，當時他們這些人大都擔任美國使館或軍事顧問的翻譯，常和美國人在一起跳舞，根本就不參加學運，因此對他們還有看法，沒想到他們都是地下黨，新中國成立後又都成了共產黨的高級幹部。

參加會議的代表住在中山東路307號的省委招待所，就在二檔館隔壁，離我們家也不遠，會議期間我曾陪父母去賓館看望他們。談話中母親問陳浩：「寶靜，四妹是甚麼時候入黨的？」陳浩回答說：「輝容是黨員嗎？不是吧？她只是個『民青』呀！」陳浩的回答讓我心生感慨，至今記憶猶新。

五舅輝寰，原是清華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因為老家的一位親戚沒有子女，外公就將他過繼給她做兒子。新中國成立前夕，那位親戚病重，要他回四川繼承遺產，回去後沒多久四川就解放了，五舅好端端地清華大學沒畢業，反被錯劃為地主。因為他的身份是學生，又根本就沒主持



外婆（左二）和她的四個女兒在北平時合影

過家業，所以後來地主的問題好像解決了，讓他在當地中學教書，可是1957年時因為土改的事發了幾句牢騷，又被打成右派，勞動改造，一直到1979年才徹底解放。後來他一直在中學裏教歷史，教過的學生很多人都考上了大學，在當地小有名氣，還當上了縣政協委員。我沒見過五舅，聽說他對自己一生的坎坷經歷倒也挺開朗，他常說的一句話是：「毛澤東讓我鍛煉了身體，鄧小平為我恢復了名譽。」

六舅很小就因患肋膜炎無錢住院而夭折。七姨輝宜自幼身體就不好，年輕時又患上風濕性心臟病，因此高中畢業後就未能再升學，後來到清華大學的基礎科工作，直到退休。姨父李振民是河北邢台人，算是紅小鬼，十幾歲就參加革命，50年代初轉業到清華，是清華大學人事處的幹部。因為他出身好，又年輕，「文革」中被造反派推出擔任幹部代表，是「四一四」派的勤務員，但他為人忠厚正直，與人為善，從未做過甚麼整人的事，人緣很好。「文革」期間我有一次到北京住在他家，曾親眼看到陸定一的兒子陸德找他商討重新分配工作的事兒，儘管陸定一當時早被打倒，但姨夫還是盡力予以幫忙。他們的獨生女李軍從清華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後又到人民大學改學經濟，再到美國留學，博士畢業後先在大學教書，後來到保險公司任高級精算師。她的先生是來自台灣的留美同校同學，家裏好像是個外交官（我曾笑稱這也算「國共合作」了），也是學精算的，夫婦倆早就考上了最高一級的精算師。如今姨父姨母早就退休，到美國新澤西州女兒處頤養天年，七姨年輕時身體就不好，可是一直注意保養，如今已經快90歲了，身體還是挺好的。

八姨輝寧和姨父胡啟俊兩人是大學同學，他們倆都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就考上了北京工業學院（即今天的北京理工大學）的無線電專業，1955年畢業後留校教書，一直到退休。改革開放之初八姨已年近50，但還是作為科研骨幹被國家選拔，派往美國的高校和研究機構實習了

二年；姨父後來曾任學校的科研處長，再後來調到北京另一個大學任教務長。他們的兩個女兒也先後到美國留學，大女兒胡莘在國內原來也是學計算機的，到美國先是讀了一個碩士，到一家保險公司從事技術工作，待到生活稍為穩定後再繼續深造，先後獲哈佛大學公共醫學院的碩士和博士，現在華盛頓的美國國家癌症中心任職，老公是比她高二屆的學長，父母也是北京工業學院的老師，在美國先在保險公司任職，後來下海，生意做得很大。小女兒胡苧先去德國後轉到美國留學，學的是會計，現在底特律的一家大學任職，老公原是吉林工業大學汽車專業的畢業生，一直在福特汽車公司任工程師，因為技術和能力卓越，汽車公司的裁員似乎永遠不會落在他的頭上。因為兩個女兒都在美國，所以姨父姨母退休後也早就移民到美國，現在大女兒所居住的馬里蘭州定居養老了。

九舅輝宗其實是我母親的堂弟，他是四叔公的長子，剛出生母親就因難產去世，自幼一直由奶奶（就是我太婆）撫養，所以他的排行就跟著我外公這房續下來了。九舅很聰明，學習成績很好，記得我們全家從哈爾濱調到南京途中曾在北京住過些日子，九舅那時是北京四中的高中生（陳昊蘇是他同班同學），還曾帶著哥哥和我到北京各處遊玩呢。1959年他考取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1965年夏天我初中畢業，父母親讓我帶著妹妹到北京過暑假，就住在清華的七姨家，也常到住在中關村科學院宿舍的七叔公家去看望太婆，因此又見到了九舅。那時他剛大學畢業，風華正茂，正要去外地報到。他分配到二機部屬下位於甘肅的一個保密單位工作，對外還不能講，後來才知道，那就是製造原子彈的一個基地。

九舅在甘肅、湖北等地工作了20多年，直到80年代初大批軍工單位下馬，允許他們自行聯繫工作才可以離開。他是北京人，當然想回北京工作，但北京戶口極為難進，舅媽家在南京，於是又聯繫南京的揚

子石化。基本條件已經談妥，正在等待發調令的時候，位於深圳蛇口的招商局剛剛成立，到處招兵買馬，也到他們單位去招聘。他們幾個同事覺得是個機會，反正在等調令，沒事先去看看再說。去了之後感覺不錯，雖然眼下條件很差，但前景卻一片光明，結果很快就決定全家搬到蛇口，成為蛇口工業區第一代開荒牛。1988年夏天我到香港探親，那時深圳還沒有機場，舅舅請朋友開車，親自到廣州機場接我。後來我決定回港定居，舅舅的家又成了我們經常來往的地方。如今舅舅舅媽早已退休，但他們的兒子和女兒全家也都在招商局工作，成了世襲的「招二代」了。

第二章

父親與母親

第一個大學生

我的父親鄭際睿（1914–2008），籍貫為廣東潮陽，1914年9月13日出生於上海。父親家中主要成員多經營商業，他上大學時填寫父兄的職業都是「商人」；但因老家還有二三十畝土地，因此新中國成立之初剛回內地時填寫的成分又成了「地主兼工商業」。後來根據中央及國務院關於提早改變華僑地富成分的相關政策，家庭成分再改為「華僑工商業」。潮州人崇尚經商，父親的長輩和同輩大都在外地或本鄉經商，而父親自幼就喜愛讀書，祖父也大力支持，因此成了家中第一個大學生。

據父親新中國成立之初剛回內地時所撰寫的自傳中說，他出生在上海，年幼時家境不錯，一家人都居住在上海，祖父當時主要在上海等地作生意，他的小學是在上海的天安堂小學和格致公學上的。在他10歲那年，因軍閥內戰（我想應該是第二次直奉戰爭吧），祖父在直隸泊頭經營的蛋廠遭到戰火破壞而倒閉，損失慘重，就此家道中落。祖父因此憂急而患病，上海住不下去了，便率全家人回到廣東潮陽的老家，只有大伯因此輟學，繼續留在上海學生意。回到老家後，父親先後就讀於潮